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2.06.005

# 季本对“河图”“洛书”的阐释

毛珩宇

(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日照 276800)

**摘要:**季本在剖析《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天地自然之易“河图”“洛书”时,反对朱熹、蔡元定“伏羲则河图画卦”“大禹则洛书叙九畴”的河洛二分说。他认为“河图”“洛书”乃伏羲教民卜筮之物,且《系辞》所言圣人仅指伏羲,与大禹无关。季本又从象数角度阐发刘牧“河洛”同出于伏羲之世说为正。季本认为,“河图”“洛书”是能识微见几的“象”,道之变化、几之吉凶于此显现,是故圣人观象以画卦。“河图”为体、为器、为中,“洛书”为用、为道、为正,二者互为表里。季本易学思想呈现出明显的心学特色,他主张卜筮以明悟本心,在心上见理,将八卦和人心之八德联系起来。

**关键词:**季本;河图;洛书;心学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6-0030-06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浙江会稽人,正德十二年(1447年)进士。师从王阳明,在《明儒学案》中被归为浙中王门学人。季氏所著易学著作有《易学四同》《易学四同别录》《筮法别传》。此外,《四书私存》《说理会编》也偶有涉及易学的言论。朱熹在《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之后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sup>[1]28</sup>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所作之《易》不同。季本质疑朱子四圣之《易》不同说,以心学释《易》,主张同圣同旨。他认为《易》虽历经四圣,但阴阳相变之道贯彻始终,一脉相承,并无二致。于是,季本在《易学四同别录·图文余辩》中,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发先儒未尽之意”。尤其是他对天地自然之易“河图”“洛书”的剖析,体现了其独特的“河洛”观。下面将分篇详述,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 一、驳“伏羲画卦”“大禹叙畴”之谬

“河图”“洛书”之名最早见于《易·系辞》,据载:“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sup>[2]82</sup>在先秦传世文献中,未曾有人将“洛书”与大禹联系起来。然而宋代以降,尤其是在朱熹和蔡元定之后,伏羲则“河图”、画八卦,

大禹则“洛书”、叙九畴似乎成为普遍共识。蔡元定在《易学启蒙》中指出:“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豫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诚以此理之外,无复他理故也。”<sup>[3]197</sup>蔡元定、朱熹认为天地万物只有一个理,理一而已,理是相通的,“河图”“洛书”也遵循此理,故伏羲则“河图”或“洛书”之理就可作易。此说为大禹则“洛书”叙《洪范》九畴提供了学理上的合理性。

南宋时,朱熹被视为独得孔孟真传的圣人。至元代,朱子之学被视为官学,享有崇高地位,尊崇朱子的人越来越多,“伏羲则河图画卦”“大禹则洛书叙畴”的说法更深入人心。明代季本为了正本清源,深入探讨前代图书学思想,质疑伏羲画卦、大禹叙畴的“河洛”二分说。他指出:

至于圣人之则“河图”“洛书”,本为伏羲兴神物以教民卜筮而发,圣人盖指伏羲也。世儒妄生意义,乃谓羲则“河图”而画卦,禹则“洛书”而叙畴,分为二圣。殊不知卜筮之事,在尧舜之世已先

收稿日期:2022-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易图集成与研究暨数据库建设”(2018VJX003)

作者简介:毛珩宇(1997—),女,甘肃庆阳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有之,不始于禹也。而禹之叙畴,又何关于卜筮耶?<sup>[4]409</sup>

季本沿袭朱子“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认为伏羲画卦是以教人卜筮为目的。至于“河图”“洛书”,则是伴随卜筮而诞生的神物。他反对朱子提出的伏羲则“河图”画卦,大禹则“洛书”叙九畴的观点,认为则“河洛”的圣人仅且只有伏羲一人,不可能出现伏羲与大禹之二圣并存的情况。季本从《易》为卜筮的角度出发,认为卜筮之事在尧舜时代就已存在,并非始于大禹。如果非要将“洛书”与伏羲之外的圣人相联系,也应当是尧、舜。在季本看来,“河图”“洛书”均与卜筮相关,若确如后世所言,大禹叙“洛书”作九畴之事为真,可这与卜筮之事又有何关联呢?季本以为,伏羲因图书以画八卦,且重而为六十四卦,文王又加以演绎而为乾坤屯蒙以及既济未济之序系之辞。

然而,朱熹为什么主张“河图”与伏羲有关,“洛书”与大禹相系的二圣之说呢?季本说道:

此因汉儒误认《洪范》九畴为“洛书”九位之事故也。<sup>[4]409</sup>

孔安国说:“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sup>[5]448</sup>孔安国认为大禹和“洛书”同出一世,禹根据“戴九履一”之“洛书”成九类。需要注意的是,孔安国并未说“九畴”,而是言“九类”。其后,刘歆、班固、王充又推衍其说。《汉书·五行志》载刘歆之言:“刘歆以为虞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sup>[6]1315</sup>班固明确指出《尚书·洪范》“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sup>[6]1315</sup>。王充《论衡·正说》云:“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畴是也。”<sup>[7]326</sup>经过诸儒阐发,“九类”被当做“九畴”,禹因“洛书”成九类,被诠释为禹据“洛书”叙九畴。大禹、“洛书”和《洪范》彻底贯通一体,“河图”“洛书”也被赋予伏羲、大禹二圣之名。

在季本看来,《周易乾凿度》所陈九宫之法确属九数“洛书”,但与《洪范》九畴无任何关联。他明确指出:

《书序》《洪范九畴》,但言大法有此九类,如《中庸》列九经之目,自宜有序,与《洛书》之义,全不相关。其曰“天乃锡禹”云者,犹言天启其衷,使知此为治

之大法耳,何必强指所锡者为《洛书》哉?<sup>[8]175</sup>

季本认为,《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已经明确说明“九畴”指禹治国理政的九条大法:一为五行,二为五事,三为八政,四为五纪,五为皇极,六为三德,七为稽疑,八为庶征,九为五福、六极。在季本看来,《尚书·洪范》九畴相当于《中庸》所列九经之目,是用来治理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箕子之所以说“天乃锡禹”,只是为了突出九畴大法的重要性,实则与“洛书”无关。

追本溯源,季本这一观点实则承袭宋代刘牧之说。刘牧在《易数钩隐图》中对《洪范》九畴和“洛书”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讨论。他指出,“今诸儒以禹受洛书,书载天神言语,陈列字数,实非通论。”<sup>[9]157</sup>“则洛出书,非出大禹之时。《书》云‘天锡禹九畴’者,盖是天生圣德于禹,诚明洛书之义。”<sup>[10]157</sup>刘牧已经明确指明“洛书”与大禹、九畴毫不相关,但其说受到朱熹、蔡元定、蔡沈等人的批驳。蔡沈将“洛书”与《尚书·洪范》九畴贯通起来,并给予系统性解释,对后世理解“河洛”产生重要影响。他在《洪范皇极内篇序》中云:“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sup>[10]699</sup>又引熊宗立的话解释此句:“伏羲得河图而画卦,以成易之象也,纪天地造化之机而作者。大禹得洛书而叙畴,以成范之数也。”<sup>[11]699</sup>蔡沈以河图为《易》,以洛书为《洪范》系统,强调“河洛”二者的分离。之所以如此,则是为了加强“洛书”与《洪范》九畴二者的关联,意图以“河图”“洛书”为桥梁,将《洪范》引入易学系统,建立自己的《易》范数体系。清代潘耒对此早有发觉,他说:“季通父子尊尚《洪范》,自作一书,以九九积数,有卦有辞。复著《洪范皇极内外篇》,欲以准《易》,故指九为洛书。”<sup>[11]406</sup>

季本“河图”“洛书”非二圣说对清儒毛奇龄、黄宗炎、黄宗羲、胡煦等人产生重要影响。毛奇龄指出:“特其在当时,图书所用,未尝分属,即《易大传》并指‘圣则’,亦第并法之为画卦之用。”<sup>[12]70</sup>毛奇龄相信《系辞》中关于河洛的说法。在他看来,既然经文已经明确指出,是圣人伏羲效法“河图”“洛书”画卦,后儒为什么又非要讲“洛书”是大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得?他还认为:“众学者或者以为河图是画卦的依据,洛书是叙畴的依据,或以为河图就是八卦、洛书为《洪范》九畴之第一畴,众说纷纭,没有确证。”<sup>[13]</sup>黄宗羲也在

《易学象数论》中说道:“谓之‘图’者,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是也;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扼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谓‘河、洛’者,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之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sup>[14]</sup><sup>14</sup> 黄宗羲认为“河图”“洛书”为地理之书,反对将图书作为圣人画卦叙畴之原。如果图书为画卦叙畴之原,那么在画卦叙畴之后,“河图”“洛书”再出现就毫无用处了。黄宗炎认为《洪范》九畴并非效法“洛书”,他在《图学辨惑》中言:“盖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条,安取乎‘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也?”<sup>[15]</sup><sup>432</sup> 胡煦继承季本“河洛”思想,在《周易函书》中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他明确说:“则神龟非出于大禹,亦非作《范》之具,又无疑矣。”<sup>[16]</sup><sup>13</sup> 胡煦批评前儒所言伏羲则“河图”画八卦,大禹则“洛书”叙九畴的二圣说,认为“洛书”不是大禹作《洪范》的工具。正是基于此,宋代图书学成为明清批判为妄的缘由。

总体而言,季本和朱熹都从各自所遵循的理论出发,来诠释圣人则“河图”“洛书”作《易》的问题。朱熹从天地万物一理之所为出发,认为“河图”“洛书”遵循一理,故伏羲则河洛之一就可作《易》;而季本从传世文献的角度出发,认为既然《系辞》并言“河图”“洛书”,那伏羲作《易》必然要同时依据河洛之理。况且圣人专指“首与神物之”,故圣人仅指伏羲,不能以禹言。郭彧对季本的这一思想也极其称赞,他说:“所谓圣人‘兴神物以教民卜筮’,言之成理,已发‘圣人以此神道设教’之意,然而其笃信‘河出图,洛出书’古有其事,亦是囿于‘圣人之言’,今天看来,不可谓之为至论。”<sup>[17]</sup><sup>164</sup>

## 二、析“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世之正

刘牧在《易数钩隐图》中说:“且经无载图书之事,惟《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此盖仲尼以作《易》而云也。则知‘河图’‘洛书’出于羲皇之世矣。”<sup>[9]</sup><sup>157</sup> 此观点遭到朱熹、蔡元定等人反对。蔡元定在《易学启蒙》中指出:“《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惟刘牧意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大传》以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但谓伏羲兼取图书,则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sup>[3]</sup><sup>197</sup> 季本为了正本清源,对“河洛”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他批驳朱、蔡等人的观点,认为刘牧“河洛”同出于伏羲之世的说法具有合理性。他在《易学四同别录》中说:

则刘牧谓图书皆出于伏羲之世,本亦有理故。蔡西山虽以孔安国诸儒之说为正,而亦以《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不能无疑。然则牧之说,岂可尽非哉?<sup>[4]</sup><sup>409</sup>

在季本看来,蔡元定承继汉儒之说是为了将《易》与《洪范》相匹配,建立《易》《范》数体系。蔡氏之所以遵循孔安国等汉儒观点,是为了利用“大禹则洛书叙九畴”之说完善自己的理论。刘牧认为“《易》韞道器”,“河图”包含四象,“洛书”是五行生成之数,“河图”与“洛书”是象与形、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故伏羲作《易》,二者缺一不可。“河图”“洛书”同是伏羲作《易》之源,故谓“河洛”同出于伏羲之世。季本认为刘牧的说法令人信服。他进一步补充道:

故“洛书”之出,当言于伏羲之世。盖卜筮之设始于伏羲,“洛书”之文必先见,故可与“河图”并言则也。刘牧谓伏羲兼取图书,岂为无见哉?<sup>[18]</sup><sup>342</sup>

季本连用两个反问句质疑朱、蔡对刘牧的批驳。他认为,伏羲则“河洛”画八卦是为了教人卜筮,“河洛”是伴随伏羲教民卜筮而诞生的神物。倘若“洛书”出于大禹之世,那《系辞》为什么要并言“河图”“洛书”呢?可见,伏羲作《易》必定见过“洛书”之文。此外,季本又从以“象”解《易》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他指出:

卜筮事之神者,乃天所生也。此章所重惟在卜筮,故揭而言之。天地道也,其为变化,即一阖一辟之谓变也。吉凶者几不可掩,而天象之所先见,即见乃谓之象也。河出图者,龙马负图出于河也;洛出书者,神龟负书出于洛也。<sup>[18]</sup><sup>341-342</sup>

季本根据《系辞》“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认为“河图”“洛书”之数是能识微见几的“象”,通过观察“象”显现出来的变化,就能预见吉凶悔吝,是故圣人观象以画卦。《周易》中的象数思想为“象”思维提供了基本“条理”,《周易》通过“象”的方式建构解释占筮体系,《象传》《说卦》就是对这种建构方式的详细说明。在《周易》占筮体系中,卦辞和爻辞都是据“象”而发,这源于《周易》的象性思维。《系辞》“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



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季氏认为“河洛”是天赋予伏羲教人预判吉凶之“象”,伏羲根据此象所显现的义理画卦。

季本“河洛”同出于伏羲之世说,另立异说,试图统一心与物。实际上,明初王祿在《洛书辩》中也有与此类似的说法。他说:“呜呼,事有出于圣经,明白可信,而后世弗之信,而顾信汉儒傅会之说。其甚者,盖莫如以‘洛书’为‘洪范’矣。吾故曰‘洛书’非‘洪范’也。‘河图’‘洛书’皆天地自然之数,而圣人取之以作《易》者也。”<sup>[19]83</sup> 季本“河洛”同出于伏羲之世说与王祿有相似之处,都认为“洛书”与大禹《洪范》无关,“河洛”非出于人为,是上天赐予伏羲作《易》之物。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季本此说受王祿影响,或可说明季本正是此类学说的创始者之一。但与王祿不同的是,季本在此思想上深入思考,从“象”思维出发,阐发了“河洛”能够彰显几微之理的妙用。

季本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胡煦也提出“河图”“洛书均出于伏羲之世,同为伏羲画卦之资的观点。他说道:“古今画卦,止伏羲一人,则此圣人,断指伏羲无疑矣。伏羲既为画卦之圣人,则‘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时,又无疑矣。‘河洛’二图既同出于伏羲,则神龟非出于大禹,亦非作《范》之具,又无疑矣。”<sup>[16]13</sup> 胡煦和季本一样,认为《系辞》中所言圣人仅指伏羲,伏羲画卦需则“河图”“洛书”,他以此来论证“河洛”同出于伏羲之世。胡煦又指出:“藉令当日,或止出一洛书,或止出一河图,伏羲即狗齐天纵,恐必无以窥天地之奥,明分合之机,察体用之微,而用以为画卦之资也。”<sup>[16]13</sup> 在胡煦看来,只有“河图”“洛书”两者相互对照,才能体悟到分合之妙,觉察到体用之理。伏羲正是根据这一道理来画卦,故二者缺一不可。

总而言之,季本“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的观点具有合理性。早在《旧唐书·五行志序》中就有说明:“昔禹得‘河图’‘洛书’六十五字,治水有功,因而宝之。”<sup>[20]1345</sup> 可见,大禹因为治水有功,同时获得“河图”“洛书”,并非只得到“洛书”。

### 三、阐“河洛”以开人心为旨归

季本仍然遵从朱熹十数“河图”(图1),九数“洛书”(图2),认为此图蕴含阴阳变易,盛极而衰之理。他进一步指出:“《河图》只是从微至著之理,一阳生而至于盛,盛而至于极,则阴生于内矣。一阴生而至于盛,盛而至于极,则阳生于内

矣。此阴阳、老少交互之体,而伏羲所由以画八卦者也。”<sup>[8]172</sup> 在季本看来,“河图”“洛书”蕴含的阴阳之气相互转化。图书中的阳气会经历由生到盛再至极的变化,当阳达到极的状态,则会产生阴;同理,当阴达到极的状态,会产生阳。阴阳消长,对待流行之体已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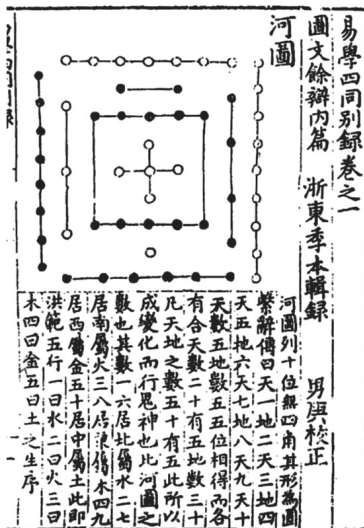


图1 朱熹十数“河图”<sup>[4]408</sup>



图2 九数“洛书”<sup>[4]408</sup>

季本认为“河洛”中间的五、十之数体现了《中庸》之中道思想。他在《说理会编》中阐发此理:

一与四,二与三,则皆为五;一与九,二与八,三与七,四与六,则皆为十。而居中五者,阳之中也;十者,阴之中也。盛于此则衰于彼,消于此者长于彼,卒归于无,过不及而已矣。故五十居中,所以明中道也。《洛书》纵横皆十五,正以明《河图》之为中道耳,非有他义也。<sup>[8]172</sup>

“河图”其数位是一、六居北,属水;二、七居南,属

火;三、八居东,属木;四、九居西,属金;五、十居中,属土。“洛书”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于中。季本认为:“河图”之生数一与四,二与三相加,恰好为五;生数一、二、三、四分别与九、八、七、六之成数相加均为十,“河图”中央之数为五、十居。“洛书”之数纵横相加正好为十五,是“河图”中央五、十之和,这表明“河图”中央五、十彰显了中道思想。此外,季本又谈道:“神妙万物者,形而上之道也;物则不通者,形而下之器也。”<sup>[8]175</sup>“河图”为体,为形而下之器;“洛书”为用,为形而上之道。“河图”与“洛书”,二者为体用关系,“洛书”是为了彰显“河图”中道思想。因此,季本说:“盖易者,阴阳往来而已。由阴阳往来之义而言,则‘河图’尽之,‘洛书’不过‘河图’之演义耳。”<sup>[4]401</sup>季本又指出:“虽名‘河图’为‘洛书’,‘洛书’为‘河图’,亦何害耶?”<sup>[4]409</sup>由此可见,“河图”与“洛书”的关系,不是理学理气二分本体论架构下的体用为二的关系,而是即体即用、体用一如的关系,也就是季本前面所说的“河图”与“洛书”的直接统一。此外,季本又肯定了“河图”“洛书”暗含动静思想:

其数五居中,五者阳之中数,以阳之中  
立体而为主于内,静中之动也。纵横  
皆十,十者阴之中数,以阴之中制用而为  
节于外,动中之静也。<sup>[4]408</sup>

在季本看来,五是阳之中数,十是阴之中数。阳动阴静,阳主于内,阴主于外。阳数之五居中,位于内,是静中涵动。“洛书”之数纵横相加皆为十,十为阴数,主于外,是动中有静。季本之所以会认为“河洛”涵动静之理,主要是源于《系辞》“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sup>[21]221</sup>。季本认为伏羲则“河洛”动静刚柔之理画卦,伏羲画卦只画一阴一阳,一刚一柔,通过刚柔的互相变易,就可以占断吉凶。季本说:“阳变阴化,动静之几也,知几其神矣。”<sup>[18]333</sup>通过观察“河图”“洛书”所含阴阳交互变化之理,则能体悟到动静消息之几。能知几微,则是“河洛”作为吉凶悔吝之象的重要作用。

阳明心学对季本河洛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季本师承王阳明,二人亦师亦友。王阳明接续《系辞》所言“辞象玩占”是圣人道统,君子“玩易”是体悟三才之道的必要途径。如此一来,占筮就具有了合法性,但是“这一合法性的赋予并不是将圣人之学下降为常人卜筮求卦德技艺,而

是以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看待占卜”<sup>[22]152</sup>。王阳明《传习录》说:“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sup>[23]90</sup>季本认为“河图”“洛书”蕴含此理,伏羲则根据此理画八卦设卜筮,教人明理,明悟本心。季本指出:

于是忧民之迷于吉凶也,而为之设  
卜筮,以前民用,将与共立于无过之地,  
此岂有所强哉?不过因其心之同,不待  
外求者而开明之,使不昧于吉凶之几,即  
其一念之觉,而得补过,以复于无咎。此  
伏羲作易之本意也。<sup>[8]154</sup>

季本认为伏羲设卜筮占问吉凶是为了“开人心”,使人不被吉凶之几微所魅惑,能够“求决狐疑,神明吾心”。在季本看来,易道广大悉备,万物之理都藏于其中,能够尽此易道者,唯在知惧之心。由此而推,季本认为道在心中,不必外求,主张在心上见理。季本易学之宗旨在于“发明杨简之易,以标心学之宗”,认为“心体虚静,乃能通灵显圣,此诚精而明自然之理也”<sup>[4]573</sup>。季本强调易之辞象变占皆由心体所发,吉凶悔吝乃心上知来知几。由此,他认为“伏羲画卦,只画一奇一偶,义已尽矣。奇之画为一,偶之画为-- ,皆象心体”<sup>[8]175</sup>。阴阳爻相互交易,变化无穷,形成八卦,而八卦重在卦德。他说:“自奇偶交互而为八卦,是状人心之八德也。”<sup>[8]176</sup>季本认为伏羲则“河洛”画八卦是为了状人心之八德,奇偶二画只是心体分合之象。乾为健德,纯阳不为阴挠,坤为顺德,纯阴不为阳挠,阳主阴从,阴阳互藏其宅,相即不离。震有警悟发生之意,巽有委曲收敛之意。兑有和悦之意,阳再生而一阴未尽。艮有定静之意,体常贞明。坎有危惧之意,阳在阴中,为阴所掩,惕然不安。离为德之华丽,阴在阳中,为阳畅美,有开明之意<sup>[8]176</sup>。八卦对应八德,八德均在人心。健、顺、警悟、收敛、和悦、定静、危惧、开明之八德,君子学习诸德行可以自我强力。季本认为修德立业工夫应在心上用力,心有良知,存有道德判断的标准,故只有澄明本心之理,才能得道。季本在《易学四同别录》跋中有诗云:“两画刚柔意若何?只须心上看中和。”<sup>[4]574</sup>季本诠释《易传》时,非常注重阐发心学之旨,将八卦卦德解释为“心之八德”非常具有创造性。

## 参考文献:

- [1] 朱熹. 周易本义[M]. 廖名春,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2] 孔颖达. 周易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三经注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3] 朱熹. 易学启蒙[M]//刘彬. 易图文献选辑(第一辑); 第3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20.
- [4] 季本. 易学四同别录[M]//续修四库全书: 第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5] 孔颖达. 尚书正义[M]. 黄怀信, 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6]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7] 王充. 论衡[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862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8] 季本. 说理会编[M]. 黄琳, 校.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
- [9] 刘牧. 易数钩隐图[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8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0] 蔡沈. 洪范皇极内篇[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805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1] 潘耒. 遂初堂集[M]//续修四库全书: 第141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2] 毛奇龄. 毛奇龄易著四种[M]. 郑万耕,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13] 王威威. 胡煦易学的河图洛书观[J]. 周易研究, 2007(3).
- [14] 黄宗羲. 易学象数论(外二种)[M]. 郑万耕,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15] 黄宗炎. 图学辨惑[M]. 郑万耕,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16] 胡煦. 周易函书约存[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48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7] 郭彧. 易图讲座[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 [18] 季本. 易学四同[M]//续修四库全书: 第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9] 王祎. 王忠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226册. 刘杰, 刘同, 点校.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0]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1] 朱熹. 周易本义[M]. 廖名春,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22] 林忠军, 张沛, 张韶宇, 等. 明代易学史[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8.
- [23]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陈恕, 编校.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8.
- [24] 张韶宇, 张沛, 等. 明代心学易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20.

## Ji Ben's Interpretation of "Hetu" and "Luoshu"

MAO Hengy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00, China)

**Abstract:** While analyzing "Hetu" and "Luoshu" in the nine pictures of the beginning volume of *Original Connotation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Ji Ben opposes Zhu Xi's and Cai Yuanding's dichotomy of "Heluo" that Fu Hsi paints divinatory symbols according to "Hetu" and Dayu makes nine rules according to "Luoshu". He thinks that "Hetu" and "Luoshu" are the things that Fu Hsi uses to teach people to practise divination, and the sage mentioned in *Xici* only refers to Fu Hsi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Dayu. Then he has the same opinion with Liu Mu that "Heluo" appears in the time of Fu Hs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pe and number. Ji Ben believes that "Hetu" and "Luoshu" are the "shapes" that can predict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symptom of a trend, and the change of principles and good or ill luck of numbers appear here. Therefore, the sage observes the shapes to paint divinatory symbols. "Hetu" embodies "body, organ, center", and "Luoshu" embodies "application, principle, impartiality", which forms an integral part. Ji Ben's theory of Yi presents an obvious feature of philosophy of the mind. He advocates divination to understand the true intention clearly, to see the truth in the mind, and to connect the Eight Diagrams with the eight virtues of people.

**Key words:** Ji Ben; Hetu; Luoshu; philosophy of the mind

(责任编辑 陇 右)